

上海青年 政治学 年度报告

2015

张熹珂◎主编
易承志◎副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青年政治学 年度报告 2015

张熹珂◎主编 易承志◎副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青年政治学年度报告,2015/张熹珂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ISBN 978-7-208-13475-1

I. ①上… II. ①张… III. ①政治学-文集 IV.

①D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8782 号

责任编辑 罗 俊

封面设计 零创意文化

上海青年政治学年度报告·2015

张熹珂 主编 易承志 副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8 插页 2 字数 277,000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3475-1/D·2780

定价 48.00 元

《上海青年政治学年度报告》

学术委员

(以姓名的拼音字母为序)

陈 尧(上海交通大学)	陈周旺(复旦大学)	郝宇青(华东师范大学)
何俊志(中山大学)	罗 峰(上海市委党校)	唐亚林(复旦大学)
王礼鑫(上海师范大学)	王向民(华东师范大学)	吴新叶(华东政法大学)
杨红伟(上海大学)	曾纪茂(上海财经大学)	曾 峻(上海市委党校)
张树平(上海社会科学院)	张熹珂(华东政法大学)	朱德米(同济大学)

目 录

学者访谈

- 003 学者应该是社会的医生
——上海青年政治学者郝宇青专访
- 012 学者也要不断突破自己
——上海青年政治学者李辉专访

研究综述

- 019 2013—2014 年上海青年政治学者关于政治改革的研究综述
- 030 2013—2014 年上海青年政治学者关于国家建设与国家治理的研究综述
- 043 2013—2014 年上海青年政治学者关于民主化的研究综述
- 056 2013—2014 年上海青年政治学者关于法治政府的研究综述
- 065 2013—2014 年上海青年政治学者关于社会治理的研究综述
- 077 2013—2014 年上海青年政治学者关于群体性事件的研究综述
- 088 2013—2014 年上海青年政治学者关于城市治理的研究综述

青年论坛

- 099 解放区土地改革中的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
- 108 治理浪潮下的中国治理制度变迁：动力、演进、展望
- 122 历史的启迪：顶层设计与民间自主
——大国治理的路径选择
- 133 基层治理现代化与政党功能的提升
——对上海市区域化党建的一个观察
- 147 风险弱化、官僚腐败与帝国衰落
——基于嘉庆年间的反腐研究
- 160 利用传统话语行为的组织化抗争
——社会运动视角下的五四运动研究

175	两大公益诉讼的功能界分及其在我国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186	网络政治谣言治理的政治学分析
200	“镇管社区”中的社区居民自治:定位、困境与突破
210	行业协会生存模式与依赖结构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基于上海市的比较案例研究
229	医疗服务体制改革的法经济学分析
240	伦理的再建:医患关系的信任危机与国家治理
251	我国群体性事件的行政生态学分析
260	埃及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变量分析

机构 巡礼

275	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
-----	-------------------

附录

277	2014 年上海政治学学术会议简讯
-----	-------------------

后记

281	
-----	--



学者访谈

吴满、马婧、胡焕芝、李乐

学者应该是社会的医生 ——上海青年政治学者郝宇青专访

问:老师,您好,非常高兴您能接受采访。您能首先介绍一下您的学术成长经历吗?

郝宇青(以下简称“郝”):与现在许多本硕博一路读下来的青年教师不同,我是经历了读书、工作、再读书、再工作,最后走上留校任教和做学术研究道路,也可以说是在现实的摸爬滚打中最终选择了做学术研究的。我是1987年考取华东师范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从华东师大本科毕业之后,我到了山东曲阜师范大学任教,在工作中得到了很多历练,也感受到自身知识储备和视野的限制,便萌生了考研的想法。在那个年代,尽管已经开始了改革开放,但是教育系统的用人制度并没有多少变化,工作单位的流动不像现在这样自由、自主。幸得在华东师大读书时的一位授课老师的帮助,我才得以在1994年重返华东师大校园,攻读政治学理论硕士研究生,成为了王松老师的学生。毕业之后,颇费了一些周折,才从曲阜师范大学调离,并到沪上一所中学任教。但是,即便工作了,依然有着浓厚的“华东师大情节”,只要有机会,便会在华东师大的校园里闲逛,重温校园的时光。正因为这样,使得我在一个偶然的的机会遇到了苏联史和国际共运史专家周尚文先生。交谈之后,周先生鼓励我报考他的博士,这让我欣喜又激动,经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在2000年又重返华东师大攻读博士,师从周尚文先生,潜心做关于苏联史的研究,并在2003年博士毕业之后留校任教。一路走来,有机遇也有努力,有曲折也有收获,有偶然也蕴藏着必然。在华东师大十年的求学经历,无论是治学精神还是学术关怀,已经在我身上深深地刻上了华东师大的印记。就我个人而言,在今后的学术研究中、在学生培养中,我将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这也就是所谓的“薪火相传”吧。

问:非常明显,您的学术经历复杂、研究兴趣广泛,我非常好奇这样的一个背景对您的学术研究会有什么影响。

郝:其实,我的经历并不复杂,当然,和你们90后的比较起来是复杂了一些。华东师大是一所具有“革命激情”、社会情怀和学术责任感的大学,这种精神来自于大夏大学、光华大学。自然,这种精神深深地塑造着我的思维方式和研究取向。就政治学学科来说,华东师大是国内恢复政治学学科较早的高校之一,有在政治学领域的拓荒者,例如,石啸冲先生、姜琦先生、张月明先生、倪家泰先生、叶立煊先生等,当然,还包括我的硕士导师王松先生、博士导师周尚文先生。从先生们身上,尤其是我的导师身上,我学到了很多,从学术知识到做学问的方法,以至于为人处世的道理,而这些都让我受益终身。

而我的工作经历驱使着我去研究当代中国的现实政治问题。本科从华东师大毕业之后,我到山东曲阜师范大学任教。与大上海相比,这样一个“小城市”让我感触很多,工作中我发现在中国广大的中小城市以及农村,不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管理,都存在着很多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更加坚定了我的研究取向,在中国做政治学研究应该立足于解决中国在政治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回应时代的关切。所以,我现在所做的一些研究,不管是民众的政治信任、社会情绪问题,还是中共执政合法性资源的再生产问题,都是基于对当代中国转型社会的观察。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都不可能没有问题,我们只有发现问题、直面问题、分析问题才能最终解决问题,我们的社会才能不断进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学者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问:如您所言,马克思主义学说或者说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学术背景对您所从事的政治学研究有非常大的帮助。但据我了解,有些学生现在对马克思主义不感兴趣,包括学政治学的学生。您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呢?

郝:这个现象确实是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原因也很复杂,大致的应该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吧:

第一,是和他们进入大学之前的学习有关。学生在上大学之前学习的政治类课程大多是意识形态的东西,学生只是为了考试而学习,带有强制性和目的性,很容易导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抵触和反感。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

在学生心里已经被“污名化”了。可以说,在学生的专业选择和兴趣选择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

第二,是和当前的教学有关。老一代的教师大都具有科学社会主义的知识背景和理论修养,习惯于用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研究问题,教授的内容也多与马克思主义有关;中青年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偏好于用西方的研究范式研究问题。随着老年教师逐渐退出教学岗位,学生接受的都是中青年教师讲授的西方理论和思想,这一点从当前许多高校的课程设置上可以看出来,这也造成了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难免会有些排斥。

第三,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有关。这个理论是一个庞大的体系,需要经年累月的学习和积累。学生在最初接触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时会感觉生涩难懂,很多就此打了退堂鼓,这也导致了許多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不感兴趣。

对于这种现状,我感觉很遗憾,最起码的是理论上的遗憾,是知识结构上的遗憾。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不掌握好马克思主义,怎么来研究和解读中国问题呢?其实,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最为核心的精髓就是它的批判精神。

问:也就是说,理解中国政治必须要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对人、对社会、对国家的本质认识上去,是吗?

郝:可以这样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而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弊端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所应具有的特征,其最终目的是完成人类社会的解放,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也为当前中国的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启示。中国的改革不仅包括经济或政治方面的改革,而且从根本上来实现全方位的社会革命。恩格斯早在1844年谈到18世纪的英国社会领域的变革时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英国自上一世纪以来经历了一次比其他任何国家经历的变革意义更重大的变革,这种变革越是不声不响地进行,它的影响也就越大。英国的革命是社会革命,因此比其他任何一种革命更广泛,更有深远的影响。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既然社会领域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的英国是如此的重要,并因此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那么,在社

会主义国家,就更没有理由不去关注社会的发展,而且从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出发,社会的发展理应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重中之重。但是,中国因建国初期塑造的“强国家”影响的遗留因素,我国的社会力量依然发育不足,在改革的过程中,国家占据主导地位,导致出现了“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这典型地反映出制度供给的过剩和社会力量的不足,同时容易诱发社会的权力本位主义,掌握政治权力的官员们的“公仆”意识缺失,并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这也是当前出现大量巨额贪腐的重要原因,严重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以社会为本位的原则。这就要求在中国改革过程中,理应培育更广泛的社会空间,将社会力量纳入到构建全面深化改革的体系中,只有社会有了发展和壮大,才能保证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健康发展和良性运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

问:提到苏联,我了解到您做过很多关于苏联问题的研究,仅学术著作就出版了《苏联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苏联的非制度化现象研究》、《新中国初期“留苏潮”实录与思考》等,能谈谈苏联问题研究为什么如此吸引您吗?

郝:从个人经历来看,我之所以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研究苏联问题是由三个方面的原因促成的:首先是个人兴趣使然。在华东师大求学过程中,我学习了有关苏联问题方面的课程,开始对苏联问题产生浓厚的兴趣,并阅读了大量相关书籍,进一步坚定了我研究苏联问题的决心;其次是授业恩师周尚文先生的悉心指导。现在流行的一句话叫“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句话很能形容我在遇到周尚文老师之前的心情。周老师帮助我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搭了一座桥梁,把兴趣转换成了实实在在的学术成果,这才有了上面提到的一些作品。周老师不仅是苏联问题研究方面的专家,还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他谆谆教诲,循循善诱,总能在一些关键地方点拨我,使我对苏联问题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最后则是因为苏联问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很多方面和苏联具有相似之处,比如,苏共的执政合法性危机问题、苏联政治生活中的形式主义问题、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稳定观等问题,这些问题也是中国当下亟需解决的问题。通过对比研究苏联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从而以苏为鉴,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解决中国问题的思路,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的平稳发展。此

外,建国初期,中国与苏联有诸多交集,苏联对新中国影响非常大,因此,要了解完整的中国政治发展历程免不了要和苏联问题联系到一起。

问:我明白了,理解苏联有助于理解当下,所以,归根结底,您的研究兴趣还是集中于当下中国,是吗?

郝:是的。在我看来,学者是要有一定社会担当的;学问不是用来秀的,是要用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这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我们搞研究就是要勇于直面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表明我们的观点。当下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攻坚阶段,社会政治经济不断变革,社会主体利益多元化,社会整体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运行状态,社会焦虑情绪凸显,政治信任滑坡等表现都很突出。学者就要敢于承认并揭示诸如此类的社会问题,而不能避而不谈,否则就失去了学术的价值本源,也就不能称之为学问。

应当说,学者应该向马克思学习,努力成为一名诊断社会问题的医生,不断对现世的社会进行批判反思,从而为社会的进步提供有益的借鉴。就像我们研究苏联问题,并非简简单单地再现当时的苏联社会,而是要深入剖析苏联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得与失,总结社会变化发展的规律,最终推动社会向更高方向发展。同时,社会发展规律的创新就是不断通过对当时生活的时代进行深刻反思才能获得。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们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历史,而是要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对当时资本主义发展遇到的问题的回应,因此,做学问也是如此,要从时代出发,而理论智慧的创获就是源于我们对时代问题的关切和回应,旨在推动人类社会的全面进步。

问:您长期关注当代中国政治,您认为这里面值得研究的问题有哪些呢?

郝:值得研究的问题有很多,每个人的视角不同,见解也就不同。从我个人层面来看,有几个问题是重要且紧迫的。

一是国家、社会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国家、社会和市场的关系一直是改革的重中之重,也是国家治理关注的重点。一直以来,中国国家相对于市场和社会依然处

于优势地位,这样的情形也造成了诸多的问题,比如贪污腐败问题正是公权力在市場使用不当所造成的;政治信任的流失也与某些地方政府为管控社会而不惜一切手段的做法有关;社会上的怨恨、嫉妒等情绪与现行的资源分配方式有着必然的联系。由此可见,如何处理好国家、社会和市场的关系是当下中国面临的一项重要议题。尽管近些年国家在慢慢让渡部分权力给市场,并增加社会的自主性,努力向“善治”方面努力,但是涉及具体操作性措施时却面临着不少困难,需要学术界建言献策,提出更多可行的方案和策略。

二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自十八大以来,政治体制改革就被提上了日程,政治体制改革涉及方方面面,既有顶层设计的问题,也有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的细节问题,其中的每一个问题都需要仔细斟酌,都值得去发掘和研究。

前几年,我在针对“体制性迟钝”原因问题的文章中,对于中国政治体制的弊病是从体制本身和人两方面来分析的。体制方面的原因有:政治录用上的任人唯亲;政绩评价上的谎报、瞒报;党政机构设置重叠,人员过多,推诿扯皮现象时有发生;政策决策机制不够透明,忽视民众利益。人方面的原因有:党政官员官德失范,“欺上瞒下”;党政官员官风不正,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党政官员官识不当,以权谋私,轻视民心。这些原因分析只是我在宏观层面上提出的个人看法。实际上,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方面还有许多问题值得关注和研究。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更要解决问题,这是学者们在研究政治体制时最应该关注的重点。

三是社会价值观念的问题。伴随着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步伐,当代中国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就,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就更是耀眼。譬如,在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定下的“超英”的目标已经达到,现在只剩下“赶美”了。但不得不指出的是,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却陷入了对技术的过度关注和依赖,甚至是对技术的盲目崇拜之中,忽视了价值领域的建设。在找不到“价值去哪儿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后,民众在迷茫中往往是去寻找精神和价值的替代品,也就是去寻找物质或者技术的刺激,去无度地纵欲,活得越来越“任性”。在价值退隐的背后是人性的扭曲,极端情绪的蔓延,因此,研究民众的价值观念,找出价值混乱的现实原因也是当下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当然,以上三个方面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但无论中国的问题有多少,作为一名

政治学学者,研究并解决中国问题,为中国发展、进步贡献力量是我们应当具备的学术情怀。

问:您谈到了学术关怀,在这里,我替所有刚入门的学生提一个问题,大家对很多社会现象都有兴趣,对很多社会问题表示忧心,应该算是有学术关怀了,但怎么把这种关怀转化为具体的学术研究呢?

郝:学术研究追根究底在于回应社会现实,作为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者,是要从中国社会发展现实出发,洞悉现实情境中的难题,构建有助于推动中国政治社会全面发展的理论体系。在此,作为一名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空有关切社会的一腔热血是不行的,因为学术关怀往往源于我们情感上的迸发,但是每一项具体研究是需要科学严谨的思维。政治学研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也要求我们必须具备理性的思维理念,就像韦伯提出的,我们研究的选题可能会受个人情感所引导,但是除此之外,研究过程必须保证“价值中立”,要确保研究过程的规范和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社会科学研究也要经得起事实的广泛验证。好的研究必须从实际出发,掌握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并将其有机统一起来。否则,空有华丽的理论大厦,就易陷入纯粹思维逻辑的推演;局限于具体的现象描述,难有普遍性理论的创造。应当说,现在不少学生都存在这些倾向,作为老师,我们有责任引导学生摆脱这种单向度的思维,将社会现实与所学的理论知识方法有机统一起来,不断发展、建构属于中国自身的政治学理论和研究范式,推动中国政治学的本土化发展,同时也能为当前中国社会的平稳转型提供有益的理论参考和借鉴。

问:我了解到您对合法性问题有不少的研究成果,能概括谈谈您对合法性这个问题的认识吗?

郝:合法性理论是政治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关的研究成果也是非常多的。总体上来看,古代和近代的政治思想家对合法性理论的探索基本上遵循着理性建构主义的传统,到了现代,则出现了合法性理论由理性建构主义向经验主义的转型,这其中,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这一转型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他提出的传统型、个人魅力型、法理型的合法性统治的三种形态对合法性理论的发展有

着相当大的影响,李普塞特、伊斯顿、派伊、亨廷顿、阿尔蒙德、帕森斯等一些大家都受过他的影响。到了当代,合法性理论的研究不得不提及另外一个重要人物——哈贝马斯。在他看来,合法性不应被单纯地理解为民众对于政治系统的忠诚和信仰,不是也不可能直接来源于政治系统为自身的统治所作的论证。他的一个出发点是,晚期资本主义之所以出现合法性危机,就是因为价值因素的缺失,因而,合法性的确立仅仅有民众认可的事实是不行的,还必须包含一定的价值规范,否则希特勒政权就是具有合法性的了。这是合法性理论发展的一个大概脉络。

合法性问题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是有了国家、有了统治才产生的。现实中,大概是到了有统治危机的时候,这个问题才获得重视,苏联就是一个典型。戈尔巴乔夫搞改革就是在应对苏联的合法性危机,可惜,走错了道路,也醒悟得太晚。我个人觉得,我们国家是要深刻汲取这个经验教训的,要把合法性问题当作中共执政的一个重要议题来研究。

具体来讲,要从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要牢固树立合法性的意识。无产阶级政党也有合法性问题。苏联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缺乏合法性意识的理论自觉是很危险的。党的执政地位不是天然的,也不是永恒的,要在实践中树立正确的执政理念,不断改进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维护好党执政的合法性。

二是要注重合法性模式的转换。不同历史时期的执政者需要不同的合法性资源来为其进行辩护,这也就形成了不同的合法性模式。在“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党就分别形成了以意识形态资源为主导的合法性模式和以经济绩效资源为中轴的合法性模式。受制于多种因素的制约,经济绩效合法性模式存在着不足。当前的环境已经为经济绩效合法性模式向法理型合法性模式的转换提供了历史条件,党应该抓住这一机遇,推动合法性模式的转型。

三是要重视合法性资源的再生产。没有什么事情是一劳永逸的。合法性问题上尤其要注重合法性资源的不断培育、维护和开发。推动合法性模式的转型其实就是在培育和开发新的合法性资源。传统上,中国共产党所倚赖的合法性资源主要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统治绩效和领袖魅力等,这里面,有些资源是不可再生的,如领袖魅力,有些资源的作用是有限的。

度的,如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对每一项合法性资源要进行深入具体的分析,这才能为合法性资源的再生产找到出路。总体上,我认为依靠单一的、特定的合法性资源是不可靠的,要注重从多领域、多维度对合法性资源进行广发的开发和维护。

问:学生们在研究中经常很难处理定量研究和质性研究的选择问题、西方理论和中国问题的结合问题、宏观理论在微观现象中的适用问题,作为老师,对学生们的这些困惑,您有什么建议呢?

郝:应该说,对于规范严谨的学术研究来讲,研究方法的选择是很重要的。我们说研究主要就分为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而不论是哪种研究,问题意识都应该是第一位的,研究方法的选择要首先立足于你想要解决什么样的现实问题,从而相应的采取合适的、科学的、能够解决问题的研究方法。现在很多学生来找我谈论文,开口就说“我想做实证”,对此我想对他们说的是,首先你要搞清楚你想研究什么问题,然后再来考虑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研究的出发点从来都是问题,而不是方法。

要把握好宏观理论与微观现象的关系,就必须厘清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宏观理论主要解决的是宏观的、普遍的或是根本性的问题,而对微观问题的研究则主要聚焦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反过来说,没有其特殊性的研究对象也不具研究价值了。因而,我们做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对宏观理论和微观对象的结合是很必要的。比如,你要研究上海的社区治理,那你要先搞清什么是社区,什么是社区治理,中国的社区治理有哪些自己的特点和已经探索出来的治理模式,并以这些为知识背景、观察的基本点和参照系,再去考察上海的社区有何自身的特殊性,二者结合去探索在上海如何能实现更加有效的社区治理。

对于西方的理论,我们应该借鉴,但是不能迷信,毕竟西方的理论是在西方的国情、民情和历史背景下提出并发展起来的,搬到中国就一定适用吗?我想未必。我们研究中国问题,首先就要立足中国的实际,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外国的理论可以借鉴,但更多的应该是学习他们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而对于他们的研究结论我们应该学会辨别,而不是盲目的迷信,更不能不加思考的就拿西方的研究结论来批判中国当下。